

文韵周刊

■ 观澜

■ 本报记者 李矫俨

科学和艺术,取径殊途,又境界相通。在二者的交汇处,我们找到了一种非常具象的表现形式——博物画。

博物画是一种以自然万物为描摹对象,通过写实绘画手法准确、客观地再现其外部形态和内在本质特征的艺术形式。在当代中国博物及生态绘画领域,曾孝濂与杨恩生是堪称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博物画里,每一处都丝丝入扣、纤毫毕现,仿佛会呼吸一般。

目前,一场名为“徜徉自然之境——大师们的艺绘人生与博物情怀”的画展正在浙江自然博物院杭州馆展出,展期至11月30日。这场画展以140余件展品展示了曾孝濂与杨恩生多年博物画创作的成就,也书写着中国科学绘画、博物绘画的探索轨迹。

勾勒 热情地讴歌自然

与普通植物绘画不同的是,博物画既要求精准反映植株各种器官的形态特征,同时又要求与艺术融为一体,兼具科学性和艺术美。

“生物绘画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绝对不是冷漠再现(描绘对象),而是要热情地讴歌自然。”曾孝濂说。

作为博物绘画大师,曾孝濂将大部分精力奉献于《中国植物志》插图工作,还为国家邮政局设计了《杜鹃花》《杉树》《苏铁》等多款邮票。

在此次画展中,博物画《麦冬》很有特色——两棵植株的上部是纤细的叶片,下部是小巧的块根,中部正好有一花一果,符合麦冬在花期后程花果同时存在的特点。植物画通常重点描绘花朵,而《麦冬》,则难得地画出了根、茎、叶、果全貌。

这是为什么?原来,麦冬看似平平无奇,却很早就被古人认识和利用,其块根是一味常用中药材。《山海经》中描述的植物“祝馀”,其原型就是麦冬。它也被记载在《神农本草经》中。

另一幅《望天树》则好似在为我国最高树种“立传”:树干高耸入云,阳光仿佛透过枝叶洒向仰望的观众。

现实中,望天树的高度可达60至100米,胸径可达2米,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最有特色的物种之一。

望天树的发现也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在五十年前,国际植物学界曾流行一种“论调”,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热带雨林,理由是中国南方森林中始终未发现由龙脑香科植物组成的优势种群。

为回应这一观点,中国植物学界迅速组织起科考队伍,深入南方湿热地区,开展植物群落野外调查工作。经过多年搜寻,1975年,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人员裴盛基和李延辉在西双版纳雨林中,首次发现了成片的野生龙脑香科植物。不久后,广西的科研人员也在当地发现了被称为“擎天树”的植物。经鉴定,两地发现的竟是同一物种!最终,研究人员以“望天树协作组”的名义联合发表了《云南发现稀有珍贵树种——望天树》一文,确定其中文学名为“望天树”。

自此,国际植物学界普遍承认中国存在热带雨林。而曾深藏于西南边陲雨林中的望天树,也终于走出秘境,以高大壮美的身影惊艳世界。

许多博物画家都在作品中,呈现出他们初遇新奇物种时的场景,曾孝濂也不例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务院组织了研究对抗恶性疟疾的“5·23”项目,曾孝濂负责其中的绘图工作,深入中越、中老、中缅边境的林区实地写生。一次在雨林中写生时,他突然听见粗粝的巨大叫声,伴随着翅膀拍打、撞击枝叶的声

他们让灭绝的古鸟“复活”,为中国最高树种“立传”—— “会呼吸”的博物画



“徜徉自然之境——大师们的艺绘人生与博物情怀”画展现场。

本报记者 徐文迪 摄



圣贤孔子鸟 (水彩和丙烯 曾孝濂 2000)



麦冬 (水彩 曾孝濂 1997)

响。抬头一看,竟是一只黑色大鸟,惊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后来,他便将这只黑鸟——冠斑犀鸟,绘于笔下。

冠斑犀鸟是一种大型攀禽,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云南,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雌性与雄性的区别主要在头部。曾孝濂特意选取了雌鸟筑巢产卵时,头部探出巢洞的时刻,生动展现出冠斑犀鸟的形态与独特的繁殖习性。

这些细致入微的描绘,不仅是对自然的忠实记录,更是对生命的深切礼赞。曾孝濂引用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瑞典人卡尔·冯·林奈的话说:“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清高的旁观者,更不是只赚不赔的生意人,我们应当是其间的一个分子。”

叠彩 复原生命的色谱

博物画大师们的画笔,不仅勾勒出当下的自然灵韵,更铺展时间的经纬,让那些湮没于地层深处的远古生灵,在艺术作品中重获呼吸与形骸。

1999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侯连海邀请曾孝濂为《中国古鸟类图鉴》上册绘制插图。该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辽西热河生物群研究”及中科院创新工程成果,计划在2000年第五届国际古鸟类会议召开之前出版。时间紧迫,曾孝濂便力荐台湾水彩画家、生态艺术家杨恩生

一同参与绘图工作。在短短两个月内,他们“极限赶稿”,共同完成了16种中生代古鸟类生态复原图。已知最早的鸟类印板始祖鸟、最古老的鹤形目秧鸡科鸟类李氏皖水鸡……这些曾在地球上存在过,如今以化石形态留存的生命,一一在他们笔下“复活”。

眼尖的观展者,会发现本次画展上有两幅复原图,虽然都描绘了圣贤孔子鸟,却有着明显的差异。

圣贤孔子鸟的化石发现于中国辽宁省北票市上园镇四合屯。它是除德国始祖鸟外,世界上已知最早、最原始的鸟类,更是热河生物群中第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的中生代鸟类化石。它的学名取自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而“圣贤”呼应历代封建帝王对孔子的尊称。科学家希望借此命名,体现学术敬意。

2000年,曾孝濂根据当时的研究成果,绘制了一幅圣贤孔子鸟复原图。这幅画作也在2004年荣获“全国科学漫画、连环画、插画大展”金奖。而随着人类对圣贤孔子鸟化石研究的深入,这幅作品却显得“过时”了。2024年,杨恩生依据最新研究成果,再次创作了圣贤孔子鸟复原图,呈现出更接近真实的古生物外貌。这幅画中的圣贤孔子鸟头颅圆润、眼廓深邃、双翼舒展、羽轴清晰可辨,

其羽毛末端晕染着墨色,仿佛仍映照着远古天光的澄澈。

两幅圣贤孔子鸟复原图的创作时间相隔24年,在其尾形和翅形的描绘上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这种形态差异,折射出人类对古生物认知的探索与进步。

实际上,绘制古生物极具挑战性。每一笔落于纸上,都仿佛是在未知之境中漫长跋涉。画家们必须在科学的严谨与艺术的想象之间不断权衡,为断简的生命寻求瑰丽的圆满。

杨恩生向记者透露,为了准确再现一只远古鸟,他常常需要向鸟类学博士反复请教,以确定这种古生物与现代鸟类在形态和习性上的对应关系。“我们要判断这只鸟是在森林活动,还是在平原上栖息。如果它生活在平原上,爪子的张开角度很可能超过120度,这样的形态更适合在开阔地步行走。”

这种能够根据习性推断外观特征的技能,源自杨恩生长年在野外对动物的观察与拍摄。他对拍摄火冠戴菊的那天记忆犹新。火冠戴菊是一种体型娇小的鸣禽,雄鸟头顶有一道橙红色的顶冠纹,兴奋时会“炸毛”,如同竖起一个火红的羽冠。一个飘着毛毛雨的春日清晨,在海拔3416米的山上,尽管冻得瑟瑟发抖,杨恩生仍然坚持蹲守,终于捕捉到动物的一幕:一对火冠戴菊“爸妈”叼着食物,冒雨赶回巢中喂食雏鸟。后来,他用水彩将其诠释为全新的艺术作品——高饱和的红、黄、蓝色交织,使整幅画面仿佛大自然的调色盘,激发着人类对自然之美的无尽想象与探索。

泼墨 色彩斑斓的诗意世界

博物画家的画作,既有对物种特征的细致刻画,也有对生态保护的深刻思考。

1992年,杨恩生带队进入海拔5700米的雪域极地,最终抵达长江源头岗加曲巴冰川,创作了名为《长江源区冈加曲巴》的水彩作品,让世界看到了长江源头冰川的雄浑面貌。

《白颊黑雁飞越修道院》是一幅描绘白颊黑雁迁徙的画作。这种鸟在北极苔原的悬崖上繁殖,迁徙路线十分漫长,需要从欧洲横向跨越大西洋飞到北美洲。“2002年1月中旬,我在西非塞内加尔的鸟类国家公园考察黑冠鹤时,与一位法国摄影师共进午餐。他向我展示了透过飞机舷窗拍下的与候鸟同飞的画面,

令我十分震惊。”杨恩生回忆这幅画的灵感来源时说。

“徜徉自然之境——大师们的艺绘人生与博物情怀”画展的策展人王思宇告诉记者:“优秀的博物画,能够准确呈现物种与物种、物种与环境之间生动而复杂的关系。”

回溯历史,博物绘画在中国有着悠

延伸阅读

■ 陈水华

写实的花鸟画可视为广义的博物画。在中国花鸟画的历史上,宋徽宗赵佶是绕不开的人物。

他的花鸟作品,风格不完全统一,大致可以分为工谨艳丽和朴拙墨笔两类。

工谨者,形象生动逼真,笔墨工致纤细,设色绚丽,法度严谨。所绘者,多为宫廷中所种植或养殖的奇禽异卉,如《五色鹦鹉图》《芙蓉锦鸡图》《桃鸟图》《竹禽图》《腊梅双禽图》《枇杷山鸟图》等。

水墨风格的花鸟作品,多描绘林中或水滨野禽,兼工带写,风格朴拙粗简,意境清远雅逸,如《写生珍禽图》《腊梅山禽图》《池塘秋晚图》《柳鸭芦雁图》《金英秋禽图》等。

《五色鹦鹉图》画中有赵佶以瘦金体所题的诗与序,大意是:在风和日丽的春天,御花园内杏花遍开,他看见一只进贡自岭表五色鹦鹉,正于松林间鸣叫飞翔,神态安逸,甚是赏心悦目。赵佶感慨万千,不仅御笔彩绘,又作诗并序。

赵佶画鹦鹉,圆眼粗颈,身姿笔直,喙形厚重带勾,尾羽长而挺立,抓住了鹦鹉的典型特征,描绘得非常逼真。鹦鹉着色富丽,且艳而不俗,眼神生动,羽毛层染立体感强。杏花花瓣先勾后染,白中透出粉红,开放姿态多样,层次清晰可见,显示出画家高超的绘画技巧,以及宋代画院典型的艺术风格。

鹦鹉是热带鸟类,主要以果实和种子为食。我国目前有9种野生鹦鹉,均分布在西南地区和海南一带。这只五色鹦鹉名为华丽吸蜜鹦鹉,并不属于我国原产,主要分布于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努沙登加拉群岛、西南群岛、摩鹿加群岛和东帝汶等岛屿。赵佶说这只鹦鹉由岭表进贡而来,而岭表指的是我国今广东、福建一带。其中,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华丽吸蜜鹦鹉的历史分布区可能确实包括我国岭表一带,只是现在种群和分布区萎缩了,很多野生动物都存在这种情况;又或者在宋代,华丽吸蜜鹦鹉确实不产于岭表,但被贩卖到岭表,然后由岭表再进贡到宫廷。由此可见,野生动物在宋代养殖和贸易的兴盛。尤其像鹦鹉这类鸟类,不仅羽色华丽,而且能学人声,如赵佶所形容的“惠吐多言”,属于智慧鸟类,和锦鸡、丹顶鹤一道,都是祥瑞之禽,更是宫廷和官宦人家养殖的主要对象。

至于为什么称之为五色鹦鹉,这里的“五”可以是实指,也可以是虚指。华丽吸蜜鹦鹉的身体大部分羽色为绿色,前额、头顶和耳羽上方为蓝色,耳羽下

久的传统。例如五代宫廷画家黄筌的《写生珍禽图》,对二十余种动物刻画精准,艺术表现力丰富。又如清代蒋廷珩的《塞外花卉图》,记录了他在塞外实地观察所得的66种野生花卉,通过墨色浓淡变化与勾勒技法,将独立花卉组合成长卷形式,兼具写实性与艺术性。

哲学教授刘华杰认为,这一传统深植于“格物致知”的哲学思想,即通过穷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得真知。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博物画一方面向着实用性强、服务于医药学的本草插图传统发展;另一方面则走向艺术性高、审美价值卓越的花鸟画传统。

现代的中国博物画,则多服务于自然科学研究等领域,其代表人物为冯澄如。新中国成立以后,历经半个多世纪陆续出版的《中国植物志》和《中国动物志》,汇集了众多画家的数万幅作品,逐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生物科学绘画风格。

而曾孝濂与杨恩生虽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但作品都着力刻画生物自然天性、关注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和直击心灵的美感。前者从科学制图的精确性走向艺术的自由表达,后者则将纯熟的水彩技法融入科普创作,注重生态主题的创作。

如今,“博物画”这一概念更凝聚起广泛的爱好者群体,将以往分散的科学插图、生态艺术等领域的创作者与欣赏者团结在一起,为这份对自然之美的热爱找到了共同归属。通过博物画,我们将看到一个广袤无垠、色彩斑斓的诗意世界。

宋徽宗的工与逸

方红色;耳羽后方的颈部两侧有一条黄色的羽毛,这就已经有四色了。喉咙和胸部为橘红色,每片羽毛均带有很宽的蓝黑色滚边。如果把橘红色和红色归入一色,那么蓝黑色与蓝色差异较大,可以独立成色,凑成五色,当然这还不算眼周的白色。像宋徽宗赵佶这样一个笃信道教的君主,是一定要將这只鹦鹉命名为五色鹦鹉的。因为按照道教的阴阳五行说,祭祀五谷之神的社稷坛里一般都摆放着五色土,五色包括青黄赤白黑,象征天下。

在《写生珍禽图》的十二段水墨画卷中,赵佶分别画了领雀嘴鸣、画眉、灰喜鹊、戴胜、麻雀、黄胸鸣、白头鸣、麻雀、珠颈斑鸣、小太平鸟、角百灵和凤头百灵,共计11种鸟类,其中麻雀出现了两次。乾隆为每幅画都题了名。

虽是水墨,但每种鸟类的特征都较为明显。尤其是领雀嘴鸣、画眉、灰喜鹊、戴胜、白头鸣、麻雀和珠颈斑鸣等,都是常见鸟类,且形态和神态都十分准确,极易辨识。黄胸鸣、角百灵和凤头百灵虽不常见,特征也没那么明确,但经过比对,仍可辨认。而小太平鸟的判断则是基于乾隆对其“古翠娇红”的题名,因为小太平鸟还有一个姐妹种——太平鸟。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尾端的颜色。太平鸟尾端黄色,小太平鸟尾端红色。因是水墨,缺乏颜色,具体哪种并无指向。但乾隆的题名中有“红”字,提示该鸟的尾端为红色。对于开封来说,小太平鸟确实比太平鸟更普遍常见,赵佶所绘的应该也是尾端红色的小太平鸟。没想到竟被乾隆给“蒙”对了。

和黄筌的《写生珍禽图》一样,赵佶《写生珍禽图》中所绘也不是什么珍禽,多为身边常见鸟类。但此图名为“写生”,自有其道理。领雀嘴鸣、画眉、灰喜鹊、白头鸣、麻雀和珠颈斑鸣都是常见鸟类,出现在画中不足为奇。戴胜和小太平鸟特征明显,且早为人所熟知,也容易入画。奇的是黄胸鸣、角百灵和凤头百灵三种鸟类,多生活在荒郊野外,特征也不明显,普通人并不容易关注,何以也成为赵佶的描绘对象?合理的猜想是,它们刚好一起被他的手下捕捉到了,于是成了写生的对象。

这幅《写生珍禽图》兼工带写,形神兼备,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也是一幅极具艺术水准的博物画。它既不同于宋代盛行的工细写实的设色花鸟,也不同于后世泛濫的纵恣写意的水墨花鸟。尤其前10幅折枝花鸟图,形态如此写实,神态如此生动,又不足笔墨趣味,纵观中国花鸟画史,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勉强可以比肩的只有赵佶同一系列的《四禽图》。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鸟类学博士、浙江省博物馆首席专家)



猫屿 (水彩 杨恩生 1991)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浙江自然博物院提供